

# 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

Forum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主 编 任保平 钞小静 师 博  
副主编 魏 婕 郭 晗 李 勇 田洪志

**QEG** 第四辑

## 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

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资助项目  
陕西省特支计划“杰出人才”  
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  
陕西省“特支计划”青年拔尖（2017年、2019年）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

新中国70年“国家规划”的历史演变、效果评价和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考察

辛 伟

政府行为、交易费用、科学技术与分工结构变迁

——一个超边际分析模型

骆佩杰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钞小静 廉园梅 罗婆锴

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西部沿线城市经济增长的绩效评价分析

任保平 张 倩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资助项目

陕西省特支计划“杰出人才”

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

陕西省“特支计划”青年拔尖（2017年、2019年）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

# 经济增长质量论坛

## 第四辑

### 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

主 编 任保平 钞小静 师 博

副主编 魏 婧 郭 晗 李 勇 田洪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增长质量论坛·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 / 任保平, 钞小静, 师博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0. 5  
ISBN 978-7-5604-4526-7

I. ①经… II. ①任… ②钞… ③师…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82836 号

**经济增长质量论坛: 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

作者: 任保平 钞小静 师博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 710069

电话: 029-88303059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389 千字

版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4-4526-7

定价: 68.00 元

## 编委会

### 顾问

何炼成 洪银兴 逢锦聚 刘 伟 白永秀 郭立宏

### 主编

任保平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 执行主编

师 博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编委(按姓名音序排列)

安同良	南京大学	钱颖一	清华大学
白重恩	清华大学	沈坤荣	南京大学
曹廷求	山东大学	盛 斌	南开大学
范从来	南京大学	石 磊	复旦大学
甘 犁	西南财经大学	史晋川	浙江大学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宋 敏	武汉大学
洪永森	厦门大学	宋 宇	西北大学
胡家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孙祁祥	北京大学
胡 健	西安财经学院	孙 早	西安交通大学
黄茂兴	福建师范大学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黄少安	山东大学	王广谦	中央财经大学
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	魏 杰	清华大学
黄先海	浙江大学	吴振磊	西北大学
蒋永穆	四川大学	谢 地	辽宁大学
雷宏振	陕西师范大学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
李 晓	吉林大学	袁志刚	复旦大学
李新春	中山大学	曾国安	武汉大学
林 岗	中国人民大学	张 鸿	西安邮电大学
林木西	辽宁大学	张 军	复旦大学
刘 灿	西南财经大学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	张维迎	北京大学
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宗益	重庆大学
马莉莉	西北大学	周亚虹	上海财经大学
孟 捷	复旦大学	朱 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前 言

经济增长质量是我和我的团队成员十多年以来,持续不断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探索阶段:1999—2005年。我从1999年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开始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并以此为题完成了著作《低成本经济发展的制度阐释》的撰写。后在南京大学洪银兴老师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时又做了一些深化,此时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逐步形成。第二,起始阶段:2006—2009年。2006年,我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支持课题为“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和谐发展”,以此为起始,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成为研究团队近年来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2010年,《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的出版标志着我们从事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正式起步。第三,深化阶段:2010—2012年。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系列(2010、2011、2012)”。在理论方面,多篇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等权威期刊;在实践方面,《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就经济增长质量等现实热点问题采访了我,我的观点、文章陆续被转载、转引,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第四,系统化研究阶段:2012年到现在。在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结题答辩时,研究成果得到了专家的好评。我的老师白永秀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院长冯根福教授建议我在这个领域继续系统推进,冯根福教授还建议我把一些研究成果往国外冲刺,为申报长江学者做准备。结题以后,我在继续出版每年一本的《经济增长质量报告》的基础上,系统推进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开始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申报项目,加强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理论研究,着眼于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体系的构建。

十多年来,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①围绕这个主题,我们在《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科学》《经济学家》《当代经济科学》《学术月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50余篇论文,其中《新华文摘》转载7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多篇,《光明日报》转载3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1篇。②出版了《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我指导的博士钞小静出版了《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我和梁炜博士主持翻译了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我和魏婕、郭晗出版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我和魏婕组织编写了《经济增长理论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我与魏婕、钞小静、师博主持完成了《经济增长理论史》(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③相继出版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0》《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省区排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3——结构失衡背景下的

经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 2014——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 2015——中国产业与行业增长质量评价》，形成了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系列研究报告。④进行了经济增长质量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现实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我从 2012 年着手进行经济增长质量基础理论的研究，在《经济学动态》《学术月刊》《当代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文章，研究和探索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理论问题；2013 年，我把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成果系统化为一本著作《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2013 年经济增长质量发布会时，与会专家对书稿进行了讨论，会后我又进行了修改，于 2014 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获得立项资助，由人民出版社在 2015 年出版，并由国家社科规划办在 2015 年 6 月进行了表彰；2017 年出版了《超越数量：质量经济学的标准与范式》，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扩展到了质量经济学。⑤获得了一些项目资助。除过《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立项资助外，出版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立项资助，《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系统与政策支持体系》获得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重大项目立项资助；2014 年，我入选首批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英才支持计划，同时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⑥培养了一批学生。一些博士生和博士后毕业以后，继续在经济增长质量方向下做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大多数先后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校内的钞小静、魏婕、师荣蓉，江苏科技大学的汤向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马强文，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谢琦近年来都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钞小静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英才支持计划，魏婕、郭晗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青年菁英奖学金”，同时，茹少峰、师博、田洪志、李勇等青年教师也加入了这个研究领域。

为了加强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理经济与统计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新型智库宏观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了“经济增长质量论坛”，这一论坛已经持续举办了四年多，每学期举办十多次，由新型智库宏观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钞小静教授、师博教授主持。“经济增长质量论坛”主要是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教师和我的学生中做出的关于宏观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章进行研讨，通过文章作者讲授、点评教师点评、参会者讨论这种互动方式促进论文作者研究水平的提升。经过几年时间，论坛积累了几十篇论文，大多数都已经发表。为了展现我们这个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师博教授的辛苦努力下，把这几年积累的成果汇集在一起，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经济增长质量论坛》出版之际，感谢经济管理学院对论坛的大力支持，感谢钞小静教授、师博教授、魏婕副教授、郭晗副教授、李勇副教授、田洪志副教授在论坛举办中付出的辛苦劳动，感谢师博教授在《经济增长质量论坛》统稿中的辛苦努力，以及西北大学出版社褚骊英编辑的大力支持和辛苦劳动。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 任保平

2019 年 4 月 8 日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编 政府治理与高质量发展

- 第一章 新中国 70 年“国家规划”的历史演变、效果评价和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考察 辛 伟 / 3
- 第二章 政府治理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 宋文月 任保平 / 21
- 第三章 产业政策、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宋文月 任保平 / 41
- 第四章 政府行为、交易费用、科学技术与分工结构变迁——一个超边际分析模型 骆佩杰 / 60
- 第五章 市场化、腐败与创新投入 郑添元 / 72

### 第二编 新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 第六章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效应——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 师 博 张冰瑶 / 85
- 第七章 创新驱动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兼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公共创新环境的政策效果 师 博 任保平 / 105
- 第八章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钞小静 廉园梅 罗鑒锴 / 128
- 第九章 中国新经济测度与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 钞小静 薛志欣 王昱璿 / 149

### 第三编 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

---

#### 第十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西部沿线城市经济增长的绩效评价分析

任保平 张 倩 / 177

#### 第十一章 FDI 数量与质量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刘戈非 任保平 / 194

### 第四编 金融市场与高质量发展

---

#### 第十二章 资本错配与企业出口扭曲

葛鹏飞 / 209

#### 第十三章 基于 Realized GARCH 类模型的中国股市波动率预测

白娟娟 师荣蓉 / 230

#### 第十四章 基于 GARCH 模型的人民币外汇期权定价研究

侯 宁 师荣蓉 / 237

#### 后 记

/ 245

第一编

政府治理与高质量发展



# 第一章 新中国70年“国家规划”的历史演变、 效果评价和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考察

辛 伟

**摘 要** “国家规划”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经过计划经济时期、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发展时期，中国“国家规划”逐渐趋于完善和成熟。本章分析了国家规划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文本分析方法总结了13个五年计划和规划在发展背景、目标内容和决策模式上的演变。通过设定指标来计算不同时期计划和规划的实施效果，发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计划和规划的发展绩效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关键词** 五年规划；文本分析；历史演变；效果评价

## 一、引 言

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来源于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改革的深化，另一方面来源于国家规划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贯串整个经济体制演变的主线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sup>[1]</sup>市场与规划相互辅助，规划的滤波器和稳定器效应能够减弱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波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为稳定。用五年计划的形式发展国民经济体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sup>[2]</sup>中国计划体制经历了发展、停滞、衰弱的过程，但后来又经历了重新改革和复兴的过程；五年计划本身经历了从越位到缺位，再到归位的转型过程。<sup>[3]</sup>13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经过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的发展，日趋成熟。

纵观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五年计划本身也发生了转型，中国计划体制改革没有走从计划至上到计划无用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计划转型的道路，进行不断地适应性转型。<sup>[4]</sup>相应的五年规划在目标的制定、决策的模式上不断完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从复制苏联式规划向基于中国实际发展状况的规划转变。“一五”到“五五”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为我国的计划制定提供了基础和借鉴，“六五”到“十五”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更强调将社会发展纳入计划中来，从“十一五”规划开始的三个五年规划将权力进一步下放，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规划转变，以宽松可浮动的规划目标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经济

和社会协调发展。五年规划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经济干扰器向经济稳定器的转变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产生平抑作用，降低波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此外，五年规划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重大作用，它是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sup>[5]</sup>从增长计划向发展规划的演进是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的过程，而五年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已经成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完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重要手段。

## 二、“国家规划”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

尽管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型，但国家发展规划的核心保存了下来，并且作为政府在战略政策协调、资源动员和宏观调控上努力的方向。<sup>[6]</sup>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规划的制定和演变，规划的建立为经济增长设定目标，为解决因经济波动、经济周期和外生冲击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的情况提供了长期的目标导向。与相机抉择结合，“国家规划”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助推器和稳定发展的滤波器。由于规划指导方针和指标设定上的差异，不同时期的“国家规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不同。“一五”时期的五年计划以稳中求进的原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进行调研和考察，具有规划和指引长期经济发展道路的作用。“二五”计划至“五五”计划基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原则，缺乏充分调研，在目标设定上存在冒进和偏离，计划经济下目标的非理性使经济发展效果与预期存在偏差。改革开放之后，五年计划的制定回归理性，指导原则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事求是”转变，计划执行效果不断提升。

### （一）稳定发展道路，熨平经济波动

首先，以发展目标稳定长期发展道路，实现发展结果的理性预期。一方面，国家规划的制定包含一系列复杂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不同部门的前期调研和讨论为规划的发展提供了事前预防机制，保证了规划目标的有效性、合理性和现实性。五年规划在发展目标和方式上的继承保证了发展道路的稳定性，提升了规划的权威性，为不同部门的规划执行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加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保障了规划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中期评估为规划的发展和执行提供了纠错机制，为应对和解决外生冲击提供了缓冲地带，辅以指导性的灵活目标管理制度，使规划的发展呈现出稳定而不僵硬、灵活而不松散的特征。通过建立良好的理性预期和管理制度，在规划执行过程中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助推作用，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减少了主客观层面可能造成的经济波动。

其次，以经济指标辅助市场发展，平抑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渐取代政府成为调节和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式，以供需和价格机制为核心，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最大化经济效益的能力和目的。但规划的制定和施行与市场机制并不矛盾，合理的规划能够对市场经济的失灵起到补充和调节作用。经济处在波动中时，国家规划以调整经济指标来抑制或鼓励投资的方式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以既定的量化指标和适当程度的行政干预熨平经济波动，以有计划的资源投放实现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从而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损失。

最后，国家规划为新政策提供试验基地，降低政策实施风险。规划在的运作过程中，是确定政策优先顺序的推动力，是政策调整的界限，是授予机构权力的依据，是决定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关键。<sup>[7]</sup>五年计划和规划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有目的地对新的政策工具给出分散化的试验空

间。<sup>[8]</sup>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年计划和规划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于新政策的试验性操作将政策效果反映在特定区域，以结果乐观与否作为是否全面推广的标准。这种试验模式将新政策可能存在的负面效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观察政策效果的同时降低了冒进的风险，避免因政策失误而导致的经济波动和社会损失。

## （二）建立量化指标，提供晋升激励

国家规划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机制是通过地方官员提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来实现的。地方官员的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效果直接相关，地方官员的政绩直接体现在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水平上，而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和评价则需要量化的指标和数据，各地区的地区发展规划均建立在国家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因此，国家规划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为行政系统提供人事晋升激励和相关约束，促进地方官员为实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努力。

首先，国家规划为人事晋升提供正向激励。国家规划通过明确五年发展期间的重点发展目标和领域以及它们的具体数量指标，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具体目标和要求，为官员提供明确的执政方向。体现政绩的任务完成度与晋升机会相匹配，这要求官员提升执政能力和效果。以经济目标完成度作为晋升的正向激励，实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促进本地区全面发展，是国家规划以官员晋升为中介促进发展的一个作用机制。

其次，国家规划以逆向指标对地方官员提供反向约束。正向指标是考核官员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而逆向指标的反向约束作用则从非经济指标方面约束官员的不作为和执政目标不合理的问题。晋升激励刺激官员完成正向指标，而超额完成的经济指标一般意味着对环境等方面的忽视和破坏，这些逆向指标的破坏程度则成为反向惩罚的衡量标准。因此，在国家规划中不但要求官员追求本地区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考虑到地区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不能顾此失彼。逆向指标的反向约束多反映在关乎生态、民主、法制和文化等方面的软环境上，而这些软环境的良好运行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和保障。因此，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一起构成国家规划通过行政官员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传导机制。

## （三）引导产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国家规划的经济侧重点在于对不同产业和地区发展的部署上，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地区资源配置的方式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因此，国家规划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不同产业发展的优先级和重点的引导上，以及对于资源市场配置方式的调节和辅助上。

首先，以产业引导经济结构变革，开发区域优势产业，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国家规划通过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表现在对于产业发展优先级别的判断和安排上，通过确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及重点培育新兴产业等，将产业发展划分为不同的优先级，并与地区资源和环境优势相结合，在实现产业合理布局的同时实施区域特色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上对资源、产业和地区的发展实施综合配置，为不同地区设立长期发展目标。同时，避免因地区产业和资源错配以及重复发展、过度发展造成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损失。

其次，实现宏观资源配置，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市场的趋利性会导致资源配置出现过度集聚，形成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平衡现象，妨碍落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此同时，市场无法配置制度、环境等公共资源，而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对这些大资源进行配置，根

据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和长期规划，有区别有重点地向特定区域倾斜，建设最适合本地区发展需求的公共资源框架，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协调和平衡发展格局。

### 三、“国家规划”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13个五年计划（含规划）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计划背景和内容，其制定和实施过程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由工业强国到共同富裕、再到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sup>[9]</sup>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决策模式由民主集中向科学决策、意识形态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是国家规划演变的历史和制度背景。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发展目标由经济增长向全面发展、发展动力由资源配置向资源创造以及改革和创新的转变是国家规划演变的具体内容。

#### （一）国家规划的制度背景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在经济制度层面，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多党协商制度的破坏与重建。在意识形态方面，由集中、保守和单一的意识形态向分散、包容和多元的意识形态演变。

##### 1. 经济背景演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1952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处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架中。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从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渡，经济发展开始全面处于计划制度的管理之下，自由市场被政府计划所取代，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代表的经济格局逐渐确立。以计划价格取代市场定价，全体国民的经济活动全部被置于政府计划的调控之下，个人作为基本劳动单位参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建设。“一五”计划期的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各项经济指标逐年上升。从“二五”计划后期开始，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整风运动”的展开，国家规划在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开始偏离预期发展轨道，这一时期的五年计划执行效果不及“一五”时期。截至“五五”计划时期，计划体制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效果和水平与预期偏离较大。

经济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了改革开放的信号，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这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递进的时期，从“五五”计划末期的经济改革开始，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虽然开始减弱但计划思想仍未完全转变，而市场经济的相关概念开始引入国家规划的制定之中，形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开始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但计划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改革和开放的力度有限，商品经济的发展存在较大约束。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0年提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1992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经济制度。

从“八五”时期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正式提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开始发挥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的经济制度，在发挥市场和计划的双重优势的同时，又对各自的缺点加以限制。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在最大化保留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的基础上，以计划方式对市场无法发挥作用或作用有限的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等非经济领域进行补充。计划一方面弥补了市场无法发挥的领域，另

一方面又对由市场波动所引起的经济波动起到了平抑作用。

综上所述，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伴随着我国国家规划的制定和发展过程而不断演进，经济制度从单一向多元转变，从排外向包容过渡，从封闭向开放改进。

## 2. 决策模式演变

13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演变过程不但体现了不同时期发展的重点和优先性，更体现了中国决策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长期处于非制度化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又重回制度化轨道的过程。<sup>[10]</sup>

首先，民主集中决策模式向个人决策的非制度化模式转变。“一五”计划至“二五”计划前期，中国处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政治协商制度开始实行，决策机制的运行处在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轨道中，对不同阶层意见的包容度较高。制度化、程序化和理性化的决策机制为重大事务的抉择和国家规划的编制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而这一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更强调内部集体决策，即党内民主决策模式。从“二五”计划后期至“四五”计划时期，计划经济已经全面建立，而意识形态领域“左”倾的社会运动使负责制定计划的国家计委受到冲击，国家规划的制定缺乏充分的前期准备。个人决策取代集体决策，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偏离制度化轨道的非理性决策机制导致“二五”计划、“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效果偏离预期。

其次，民主集中决策模式与制度化轨道的重建。随着“四五”计划的结束与社会环境的逐渐稳定，“一五”计划时期的决策制度得到恢复和重建。历经“五五”计划和“六五”计划两个时期，民主集中的内部集体决策模式被重新建立起来。同时，国家计委的重建和改组也将国家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带回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轨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由封闭向常态化开放状态转变，相应的决策模式也开始改变，民主集中制下的内部集体决策机制逐渐恢复到“一五”计划时期的状态。“五五”计划和“六五”计划时期的决策主体仍然局限在政府内部，内部集体决策模式下的国家规划编制虽然在制度化的框架下进行，但这种决策模式仍然是一种政府关门编制计划的过程，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分析，<sup>[11]</sup>加之信息搜集得不充分和不准确，进一步影响了五年规划实施的效果。

最后，集体决策模式向科学决策模式的演进。从“七五”计划开始，决策模式开始由民主集中制下的精英集体决策模式转向更加合理和民主的科学决策模式。决策权力的下放和进一步分散以及除政府部门之外的不同阶层在国家规划制定中参与程度的提高使决策机制在制度化的基础上更加的科学化。政府部门内部、外部精英以及社会大众相互合作对规划的内容进行讨论，在指标和目标制定上遵从全面、综合、包容的指导思想，将民众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期望融合在国家规划的制定中。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与决策程序上的科学化对最终规划的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规划目标的优先性逐渐从经济数量的增长转向了社会发展和民生水平提高等方面。

## 3. 意识形态演变

我国的意识形态是“自上而下”的强化和统一过程，意识形态的演变直接体现在国家规划的指导方针演变上。指导方针的选择，既来源于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思路，又受制于领导人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在内的国情条件的认识。<sup>[12]</sup>中国的意识形态演变是制定国家规划的民意基础和前提，也是对民众思想转变的具体回应。在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制定中，意识形态的演变经历了两个大的转折阶段，

是从分散到统一再到包容，从开放到封闭再到解放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处在政治制度初建和经济领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领导层和民众对于社会主义各领域的建设处在摸索过程中，这一时期民众的思想处于新旧交替阶段。官方意识形态对于民众的多元化思想与意识形态包容度较高，没有对民众的个人意识形态进行强制性统一。因此，思想意识形态上呈现出分散化和多样化的特征；与此相对应，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民主程度和自由程度也比较高。这一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经过了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群体的讨论和调研，秉持务实发展和稳步提升的理念，其实施效果在所有计划时期的五年计划中相对显著。

意识形态领域的第一次转折始于“二五”计划后期，随着计划经济的全面推行和计划程度的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同一化程度逐渐提升，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宽容程度开始降低，要求全体国民形成统一的与官方相一致的意识形态。这一时期是以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一全国，并通过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不断宣传来强化思想领域的统一性。意识形态上的“左”倾严重影响到了国家规划的制定，思想上的封闭性和激进性以及追求速度的空想主义导致经济领域的长期发展呈现出较“一五”计划时期相对缓慢的态势。意识形态领域的第二次转变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打破了思想意识上强制性和统一性的藩篱，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思想开始普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仍然是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但其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压制逐渐弱化，官方对不同意识和思想在发展上的包容性不断提高，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和接受其他“非官方正统”思想，自由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由南向北，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发展从多个层面为多种属性的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心理和制度的双重保障，经济增长开始沿着实事求是、稳步增长的道路不断前进。

## （二）国家规划的目标内容演变

五年规划的文本是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文件，参考杨扬，张继平（2013）<sup>[13]</sup>的方法，通过提取五年计划和规划文本的高频词，分析各个五年计划和规划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重点，以NLPIR-ICTCLAS软件对13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在过滤无意义词后所得到的词频排名前50的高频词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规划文本高频词

词频排序	“一五”计划	“二五”计划	“三五”计划	“四五”计划 <sup>1</sup>	“五五”计划	“六五”计划	“七五”计划
1	工业	发展	投资	计划	发展	建设	发展
2	建设	工业	建设	建设	建设	发展	建设
3	发展	建设	安排	增长	农业	技术	技术
4	国家	农业	项目	国民经济	工业	工业	加强
5	计划	加强	工业	指标	社会主义	提高	经济
6	地方	国家	增加	经济	技术	增加	工业
7	农业	提高	规模	发展	经济	加强	积极
8	加强	人民	地区	工业	增加	计划	提高
9	提高	增长	三线	农业	提高	经济	逐步
10	企业	地区	农业	突破	企业	地区	增长
11	增长	增加	发展	总产值	国家	增长	企业

续表

词频排序	“一五”计划	“二五”计划	“三五”计划	“四五”计划 <sup>1</sup>	“五五”计划	“六五”计划	“七五”计划
12	部门	经济	技术	粮食	加强	研究	地区
13	单位	社会主义	计划	调整	革命	积极	国家
14	国营	技术	钢材	战略	坚持	能力	管理
15	逐步	逐步	国防	水平	基础	国家	投资
16	经济	计划	生产能力	集团	水平	改造	开发
17	技术	部门	机械	协作区	基地	能源	改造
18	地区	事业	建井	钢铁	积极	社会	增加
19	商业	企业	部门	投资	地区	企业	社会
20	增加	积极	提高	三线	人民	开发	政策
.....	.....	.....	.....	.....	.....	.....	.....
50	降低	财政	加工	经济体	规划	农村	农业
词频排序	“八五”计划	“九五”计划	“十五”计划	“十一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	“十三五”规划	—
1	发展	发展	发展	发展	发展	发展	—
2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
3	经济	经济	加强	加强	服务	服务	—
4	技术	提高	提高	提高	推进	推进	—
5	加强	加强	经济	完善	加强	加强	—
6	提高	技术	企业	资源	完善	完善	—
7	地区	企业	社会	推进	管理	体系	—
8	积极	市场	改革	经济	提高	制度	—
9	逐步	社会	结构	社会	社会	创新	—
10	改革	开发	完善	开发	经济	机制	—
11	企业	地区	市场	管理	加快	加快	—
12	开发	建立	技术	服务	制度	社会	—
13	工业	积极	制度	制度	体系	提高	—
14	管理	增加	积极	改革	机制	建立	—
15	基础	管理	体制	企业	资源	安全	—
16	教育	完善	推进	建立	改革	健全	—
17	社会	社会主义	地区	能力	能力	经济	—
18	增加	结构	加快	促进	创新	企业	—
19	市场	基础	服务	区域	公共	国家	—
20	水平	改革	建立	机制	文化	生态	—
.....	.....	.....	.....	.....	.....	.....	—
50	科技	合理	健全	利用	利用	强化	—

资料来源：历次五年规划的正式文本和草案。

注：1. “四五”计划时期计划文本数次变更，因此以对“四五”时期计划内容的简要介绍作为文本进行分析。

13个五年规划的高频词变化如表1所示。通过对高频词的排序变化进行比较可知，在“七五”